

◎海外华文文学·东南亚篇

东南亚华文文学： 融合发展开新局

李晨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强，东南亚华文教育和华文报刊得以恢复发展，华文文学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增强，亦促使其发展出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学样貌。

经过几代作家不懈努力，东南亚华文文学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与资本，呈现出“文化认同”与“本土意识”、“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性追求”相互补充、融合的发展趋势。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复兴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复兴，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表现尤为突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一辈作家方北方、韦肇分别创作了《花果飘零》《使徒行传外记》，吴岸、姚拓、李过、原上草、驼铃等老作家也不断推出新作，注重现实性和乡土性，艺术表现形式不断创新。

在前辈作家现实主义创作风潮影响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批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东南亚本土作家逐渐成熟起来。曾在上世纪末以《吉隆春秋》《海东青》等作品驰名台湾文坛的旅台马华中生代作家李永平，新世纪以来先后出版了《雨雪霏霏》《大河尽头》《朱鹮书》等作品，其中《大河尽头》对婆罗洲的书写极富东南亚华文文学特色。祖籍河北、出生于台湾、后定居马来西亚的作家戴小华的新作《忽如归》，则以纪实笔触回溯了自己的家族在时代动荡中的迁徙史。

上世纪末，华文报刊的作用再次凸显出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蕉风》等华文报刊积极举办文学评选活动，培养新生代作家。《星洲日报》自1991年开始举办“花踪文学奖”，每两年一次。举办二十多年来，黎紫书、龚万辉、曾翎龙、梁靖芬等一大批新生代作家脱颖而出。他们的创作心态多元开放，在作品中往往表现出双重边缘意识、历史关怀和东南亚乡土情结，通过作品表达对族裔命运的现实关怀以及对创造多元文化中独特的华文文化的追求。随着这些新生代作家的逐渐成熟，他们的身份也慢慢由参赛者转变为评奖者，标志着东南亚华文文学进入世代更替的新阶段。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外，泰国作家巴尔的长篇小说《湄河之滨》体现了



东南亚风光 赵航摄

老一代泰华作家从事业余创作数十年，为大众创作的宗旨；菲律宾作家施约翰的小说《天涯》中的羁旅情怀，充分表达了对东南亚华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印尼作家黄东平反映荷兰殖民统治下爪哇农村灾难的小说《女佣细蒂》曾在《联合早报·小说版》连载3个多月，引发极大关注。

与本土文化良性互动

多年来，东南亚华人秉持对中国文化较强的认同感，积极建设并维系当地华人社会圈。随着东南亚华人日益融入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其主体意识不断变化，文学表现形态也随之变化，导致东南亚华文文学在保留原有的中华文化传统的同时，开始植根于东南亚土地，显示出愈发强烈的本土意识。

一般而言，各个时期自中国移民至东南亚地区的第一代华人都有着较为浓厚的侨民意识，作为历代移民东南亚的开拓者，他们既有对故土的眷恋，也满怀在新家园奋斗的雄心；他们的子女——第二代华人已在东南亚本土生长的华裔群体，虽然对祖籍国充满文化想象，但其认同已经有所转向。而第三代华人及其后裔，在二战后出生，他们的认同已经在全球化趋势中丧失了稳定性。

相较于前代作家，今天的新生代华文文学作家有着更强烈、更自觉的意识，他们从身份认同的桎梏中跳脱出来，试图通过创作探求海外华人在现居

国如何既保有自身民族性，又与当地文化中的本土性构成良性互动。这种转变与融合在新加坡作家梁文福的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梁文福不仅在诗歌、散文、小说等领域创作成绩骄人，还是东南亚著名的歌手和词作者，他的《烟水》和《风沙》《其实我是在和时光恋爱》等作品，充满了将中国古典诗词内化后的重新翻用。他通过巧妙营造意象，借用象征、隐喻等手法，融合本土化的叙事，使诗歌具有超强的表现力。同样，陈大为的诗集《治洪前书》《再鸿门》《尽是魅影的城国》也以独特的见解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重新诠释，企图通过个人视角建立一个包含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东南亚华人祖先垦殖拓荒的移民史和个人家族命运史在内的庞大历史图景。黎紫书的《炎场》以追忆的形式写出了东南亚由“异乡”变为家园的转变过程。

这些崛起于全球化语境中的新生代、新移民作家，与现居国的关系摆脱了前辈作家的紧张性，他们巧妙利用介于祖籍国和现居国间的“边缘”属性，以文本呈现出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

多元互补的创作手法

东南亚文学受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感召，选择现实主义作为基本创作方法，立足于表现东南亚殖民地底层劳苦大众的生活、反映他们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在战后东南亚华文文学

写作是捡拾的艺术，同时也是忽视的艺术。有忽视，才会对另一部分有更深的专注。但麻烦在于，到某一个时刻，被你忽视的，会通到你面前来，它不仅让你正视它，还要你走进它的内部去。这时候才发现，所谓忽视，其实是另一种专注——你知道它在那里，始终等待着你的目光。城市于我，或者说成都于我，就是如此。

我到成都生活整整20年了，但《寂静史》之前，我从没写过成都。我出生在川东北大巴山区，在我出生的年代，对山区人而言，城市是另一个世界，城里人也是另一种人。我的大部分小说，是在对城市的渴望中完成的。我真正从事写作，始于成都。可在我笔下，城市只是远方。我脚下的街道，包括离住家很近的金沙遗址、文化宫、杜甫草堂、宽窄巷子，与我故乡的山水、丛林和瓦舍相比，只是模糊的背景。当然，这背景不是纸做的，它充满张力，与乡村形成强烈映照，《大嫂谣》《我们的路》等小说，就是这样写就的。

说不清是哪一天具体的时间，故乡在我心里变得陌生起来，她不再是我知道和熟悉的那个故乡，也不再欢迎我以固有的眼光和笔调去审视她、书写她。她变了，她比我更懂得时代的含义。这时我发现，我与城市的关系，言说城市时的心境，都和以前完全不同。城市不是远景，城市就是现实，即使还没构成现实本身，但小溪向大河汇聚，也已形成潮流。于是，《丹氏春秋》《声音史》等，为我意念和想象中的故乡轻轻地关门关上，我就专注于认识眼前人了。这眼前人就是成都。

十多年以来，我身边的成都竟有了那么多变化。变化一直在发生，只是以前被我忽视了。我几乎是在无意识之中，见证了某些事物的消亡和生长。

刚到成都的几年，我常去小区外公园旁的报刊亭买书，包括发表我作品的杂志。但有一天，报刊亭锁上了，锁上后就再没打开。又过些日子，那个亭子不见了，地上黯淡的印迹被冲刷干净，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离家有七八分钟路程有个邮局，我去那里寄信，寄稿子，也取稿费。但有一天，却罩上几米宽的卷帘门，随后变成了一家超市。我并不在意，因为稿子早就是网上发送，稿费也是打到银行卡上了。小区西门出去，走百余米，是府南河（杜甫笔下叫锦江）的支流磨底河，老远就臭不可闻。仿佛是突然之间，臭味逃跑了，浑浊的河水变得清亮，满河的水草也被清理。河的两岸，植满鲜花、翠竹和果树，某一天来了白鹭，独自或成对飞翔，鸣叫声带着金属音。与三星堆一脉相承的古蜀文明金沙遗址，距我家也不过百余米，成了成都国际马拉松比赛的出发点，赛事当天，凌晨4点过，街道上就喧声笑语。来自远方的人，远到异国他乡的人，也来观看或参赛。快递小哥在楼道上奔跑，有天为我送来快递的，竟是我的同村人，他把家也带到了成都，孩子在西城实验小学外语学校念小学……

人因农业而定居，因定居而有了乡村与城市。具体而言，或因城而市，或因市而城，成都属于哪一种？不管怎样，自公元前5世纪古蜀国开明王朝迁都于此，作为城市而存在，成都已有2300多年历史了；若以金沙遗址论，成都的建城史可追溯到3200多年前。自从有了都江堰，成都沃野千里，民殷粮富，“天下谓之天府”。漫长的岁月里，这里孕育出灿烂的文明，包括中国第一副春联：“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也包括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词集《花间集》。

成都一直在变，但有些东西一直不变。1911年6月成都发起的保路运动，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李劫人的《死水微澜》《大波》等，对此有生动的展示。川军在抗日前线的壮烈牺牲，受到国人的崇敬。汶川地震、脱贫攻坚、新冠疫情、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成渝经济圈、国家中心城市……成都在这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出的勇气、智慧和担当，也为世人所称道。我所认识的成都，还只是一个侧面，要深入这座城市的灵魂，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寂静史》作为主题性长篇小说，其实是由7个中篇组成，书写成都，是其中的部分篇章，成都、成都人和来到成都的外地人，有待我用诚心、耐心、恒心和敏锐的触觉，去感知他们的心跳。这考验着我潜水的能力。写作者是从低处观察生活，正如本雅明所说，凌晨起来打扫大街的清洁工，或许比谁都更了解一座城市。普通人的生活面貌，是一个社会的呼吸，也是一座城市的呼吸。呼吸顺畅，便生命勃发。人如此，文学也如此。

（作者系《四川文学》执行主编）



《成都意象》 郭红松绘

复兴过程中，新马的方北方、韦肇，泰国的年腊梅、方思若，菲律宾的施颖洲、林涛，印尼的周颖南、冯世才，缅甸的黄锦卿等都是特点鲜明的现实主义作家。另一方面，战后东南亚各国走上独立之路，各国、各代作家在重新梳理历史时的想法与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反传统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潮高涨，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关注个人内心的真实及作品的形式技巧。现代派大多在作品形式上下功夫，有时难免晦涩艰深，但也有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早期东南亚华文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中略显浅陋的缺陷。二者的关系在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次论争之后渐趋缓和，现实主义作品的文学技巧有所提升，而现代派的作品也开始注重在思想主题上走向反映社会问题的层面。

近年来，东南亚华文文学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开始出现合流，新生代作家采用历史反思、存在主义、象征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等多种手法创作了大量反映东南亚地区华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问题的作品。黎紫书的《州府纪略》通过寻觅个人人物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被剥夺的痕迹重述历史，不动声色地淡化了传统的政治话语，以碎片化的手法颠覆主流话语叙事。张贵兴的《群象》《猴杯》，通过感化叙事和感官性处理将东南亚社会现实世界中的雨林再现实出来。吴岸的《墙》《舞者》《信念》等诗作成功运用象征手法，达到了写实与写意的完美结合。朵拉的《钟摆》《唱片的日子》通过变成钟摆、唱片反映了人性的异化，影射现代人的迷茫与困惑。唐珉的《复活》以魔幻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的手法寓示底层劳动者的悲惨境遇。翁兹尉的《弃物祭文》运用意识流的手法，以开放式的结构赋予了语言新的活力，极具实验性和现代性。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立足于东南亚社会发展现实，与现实主义的互补、融合成为其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的特殊之处。

在华社、华报、华校三大支柱的支持下，东南亚华文文学经过曲折坚韧的发展，展现出复杂多元的创作风貌，也在努力跨越“文化认同”与“本土意识”、“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性追求”的界限，将东南亚华文文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多民族文学名家走进西昌

本报电（文一）2020《民族文学》彝文作家、翻译家培训班暨“多民族文学名家走进西昌”文学实践活动近日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举办，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作家冯艺、王久辛等参加活动。西昌是多民族聚居地，这次活动使来自全国各地的多民族作家目睹见证西昌的新时代建设成就，从而启发灵感，引发生思。同时，也使西昌当地各民族作家、翻译家和文学爱好者有机会与国内多民族文学名家交流切磋，分享创作心得，提高创作质量和翻译水平。

◎编辑荐书

始于立春，终于大寒，春分萌芽，寒露蛰伏，二十四节气定义了中国人的岁时体验，潜藏着中国人的生命密码。近日，台湾作家蒋勋散文作品《岁月静好：蒋勋的日常功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二十四节气为时序，记录了作者对美与身体、文明与道德、律法与自由以及自我与修行的诸多感悟。全书近百篇文章，每一篇都是一帖生活格言，以图文配合的方式，分享了作者对二十四节气的真切体验。



蒋勋 岁月静好

中国作协“纪录小康工程”研讨会举行

本报电（文一）中国作家协会“纪录小康工程”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共同为“中国作协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图书以及《易日记》《书写新时代的创业史》等由中国作协组织创作、编写的“纪录小康”主题图书揭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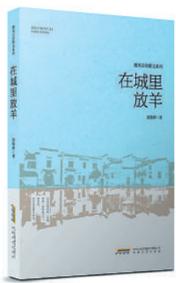
会上揭晓了中国作协“纪录小康”主题创作推荐书单，其中包括长篇小说8部，分别为《经山海》《海边春秋》《战国红》《驻村笔记》《琵琶国》《北京到马边有多远》《逐光的孩子》《浩荡》；报告文学8部，分别为《乡村国是》《国家国是》《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浦东史诗》《悬崖村》《高高的元古堆》《中关村笔记》《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

◎新作评介

何须一派喧丝竹

——评沈俊峰散文集《在城里放羊》

张凡 张银蓉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自小生长于大别山的作家沈俊峰，将心中对这方水土的深情与眷恋，深藏于笔下那充满灵动的文字之中。散文集《在城里放羊》以44篇文章连缀而成，字里行间流露出作家对故乡、对人生和对过往生活的真切感知和情愫。

沈俊峰善于以饱蘸深情的笔墨将周遭的人与事、人内心的情感向世人娓娓道来，以至至真至纯的心绪述他人之事、抒人之常情，其间的深刻性以及文字背后传递出的情感力透纸背、意蕴深远。片刻的思索往往都会激起他心绪的点滴微澜，他又如何抵得了彼此情感的真情对碰呢？对女儿的恋恋不舍，对父亲感同身受的喟叹，对母亲的深深关切，诸如这般情感细节在该书的字里行间比比皆是。《送你一束康乃馨》中，作家以母亲节和为母亲过生日为契机，原本打算送母亲一束康乃馨，却因父亲的拒绝而不得不得最终作罢。《五月在医》中，因母亲术后需住院，“我”以陪护的身份见证并忆起了父母的过往和生命不易。在《父母是孩子的一座庙》中，“我”暴露出嫁女的复杂心情以及父女间的“离别”，终于生发出“想来，父母便是孩子的一座寺庙吧”的感叹。沈俊峰以个人经历和日常见闻寄情散文，无论离愁或是别绪，自他笔下流露出的均是轻盈而又扣人心弦的一往情深。

面对惯常如水般的现实生活及人生，作家写道：“生活不是表演，那种对表演生活的喝彩与掌声，是轻浅的呈现。”他追忆往昔，感念曾经被搁置在一旁的人生片段或经历，这些刻骨铭心的过往偶尔被时光挑起，想来该是一首首娓娓道来的诗篇，既富有深韵、又极为感人。面对冗杂的生活与无序的日常，惟有亲身经历才能感受到生活赋予每个人的独特滋味，“我没有勇气像那位作家一样直抒胸臆，我只能遮遮掩掩，像一个矫情的汉子，内心的情感却是万马奔腾。”当然，若以亲情这条脉络来梳理，作家的经历、观察和表达都贴近常人的情感与生活，可是难以言说的话语只能在内心深处默默地遣词造句，这不正是中国式亲情最

为直接、也最为令人心醉的表达方式吗？

学者陈剑晖在谈论《关于散文的几个关键词》时提到，“感情有文学的因素，也有非文学的因素；有具备很高审美价值的真，也有毫无艺术意义的真。”许久以来，沈俊峰力求将现实生活的“真”作为创作的基点和出发点，试图在艺术世界中提炼出生活的另一番趣味。散文集《在城里放羊》以“我”之观念与记忆中的亲情和人生际遇为抒写原点，将自身对生活日常的体悟和感知融入文字世界，让读者真切领悟到现代都市人情世界中那些触手可及的质朴和浓情。

虽说作家各自所处的叙述环境、时空、境况迥然有别，却都可以充分感知到外界风物向人默默传递的那一丝一缕的讯息和由此产生的情感律动，并以此为契机赋予于文字。

自小受到徽文化熏染的沈俊峰，以徽文化的神情风韵去悟道人生和感知日常，他的文字多是日常经验与个人阅历的唯美再现。他将内心深处无比温暖的亲情凝结成笔下一个个简约却饱含人情味的大小不等的篇幅，隐约可见在他的文学世界中，亲情乡情部分所占据的重要位置。

（作者分别为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